

# 浅析清代山西农村集市及庙会

乔 南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清代的山西商人在全国商业金融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山西农副产品加工业、工矿业等商品生产的发展十分活跃,但清代山西的集市发展并没有呈现“活跃”的情形,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土地贫瘠,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天灾影响,“丁戊奇荒”使山西人口急剧减少;庙会的替代作用。

**[关键词]** 农村集市; 庙会; 替代作用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556(2008)03-0056-06

## Country Fair and the Temple Fair of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QIAO Nan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merchant of Shanxi province produced the splendid achievement in business circl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dustry, mining industry developed quickly. But the country fair did not developed. The reasons were: First, there was poorer soil in Shanxi province, and the productive forces were not well-developed. Second, the disaster reduced the quantity of the people. Third, the replaced effect of temple fairs.

**Key Words:** country fair; temple fair; replaced effect

### 一

集市是人们约定俗成进行定期交易的场所。山西的集市发展兴起于明代,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灾荒而一度衰落,经康熙、雍正年间的恢复、整顿,到乾隆时进入全面、持续发展阶段。据估算,在清代中叶,山西集市数量已达到1600个左右,光绪年间增至近2100个,平均每州县有集市20个左右。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对集市牙行、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清理、整顿,使集市管理开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而对农村集市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集市数量的增长,集市分布密度大大提高。到清代中叶,山西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性高、密度大的集市网,集市贸易逐渐成为山西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省治太原周围有许多集市,其中,阳曲县城内有城西米市集、上北关集,四乡还有阳曲镇集(在城北

三十里)、青龙镇集(在城北五十里)、黄土寨集(在城东北六十里)、东黄水集(在城东北八十里)、大孟镇集(在城东北九十里)、阳兴镇集(在城东北一百三十里)、东社村集(在城西十五里)、河口村集(在城西八十里)、向阳镇集(在城西北三十里)、西高庄集(在城西北四十里)、泥屯镇集(在城西北五十五里)、官头村集(在城西北九十里)、大川都集(在城西北九十里)、岔上村集(在城西北一百里)、小店镇集(在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共有十七个<sup>[1]</sup>。蒲州府城内,“大市在东关,急递铺南,北牛站巷,东西皆列肆店,交易者朝往暮归,日率为常。……鼓楼下新集,每月六次”<sup>[2]</sup>。蒲州府城外,“东丰镇集在州东三十里,考老镇集在州东北三十里,东张镇集在州北五十里,大阳屯集在州南五十里,焦卢屯集在州南五十里,小李屯集在州南八十里,永乐镇集在州南一百一十里”<sup>[2]</sup>。运城“四关各十日轮转”<sup>[3]</sup>。

[收稿日期] 2008-01-25

[作者简介] 乔 南(1978-),女,山西洪洞人,历史学博士,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教师,研究方向是区域经济史。

山西集市以每旬开市二至三次最为普遍,集期大都以一六、五十、二七、四九、三六九相搭配。如乾隆年间,隰州共有九个集市:康城镇集以一六为集期,水头集和大麦郊集以五十为集期,石口集以四九为集期<sup>[4]</sup>。乾隆年间,汾州府介休县境较大的市集有“东关月十五市,张兰镇月十五市,郝家堡月十五市,湛泉镇月十五市,孔家堡月十五市,义棠镇月十五市”<sup>[5]</sup>。

也有每旬开市三四次或更多者。清初,浮山县城四门均有集市,按季轮换。雍正年间,县城集市设在东西两街,每月农历三、六、九日为集日<sup>[6]</sup>。解州安邑运城城内的集场为四关轮集,运城集场在城内东西北三关十日一轮<sup>[3]</sup>。临县“城内每逢单日则集,由四坊递轮。逢一在东关,逢三在下市楼,逢五在贤良坊,逢七在文庙西,逢九在东门”<sup>[7]</sup>。光绪年间,潞安府长治县境内有多处集市,有荫城、西火、韩店、苏店、八义等十五个集市。“城内以二、四、六、八、十日市;鲍店镇、石哲镇、大堡头村、张庄村、南漳村、东里村、南席村俱以一、三、五、七、九日市;璩村镇以三、六、九日市;南呈镇、郭村以二、五、八日市;布村以一、四、七日市。”<sup>[8]</sup>平定府盂县在清末,全县有城关、上社、西烟、牛村四大集镇,设固定集日。城关双日为集,其他镇有单、双集日之分,每月集日最多为六次<sup>[9]</sup>。大同府灵邱县城东“凡贸易工作悉居之,士民亦杂处焉,双日为集,……集初设关厢内,近数载贸易颇伙往来拥挤,市民咸以市集起色”<sup>[10]</sup>。平定州寿阳县境内的集市也非常频繁,见表1。

表1 清代平定州寿阳县境内市集

地点	位置	时间
县城	城内	一、三、五、七、九日集
张净镇	县正东三十里	二、六、日集
羊头崖镇	县正南三十五里	一、四、八日集
北河镇	县西南五十里	三、六、十日集
西落镇	县西南八十里	二、五、九日集
遂城镇	县西南七十里	(按今无集)
太安驿镇	县西南五十里	四、九日集
胡家堙镇	县正西八十里	一、六日集
段王镇	县正西四十里	三、八日集
上峪镇	县正西三十里	四、九日集
南燕竹镇	县正西二十五里	三、八日集
平头镇	县西北六十里	五、十日集
宗艾镇	县西北二十里	二、六、十日集
解愁镇	县正北四十里	四、八日集

资料来源:马家鼎,白昶,张嘉言.《寿阳县志·舆地志·形势》(卷1).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集市所贸易的商品种类多样,太原府榆次县农耕所用之牛马、家禽等多在集市上“买之旁县”,而县内民人善于用柳条编织器具和苇席,或种植时令瓜果,亦多在集市上交易,从而“岁资之为利,以供衣食租赋”<sup>[11]</sup>。解州集市和店铺的商品也较为丰富,“顾商贾聚处,百货骈集,珍瑰罗列,见于无物不有”<sup>[3]</sup>。大同府灵邱县城内集市贸易商品包括“肩蔬负薪粟粮布匹之类”<sup>[10]</sup>。保德州集市在城中,“仅粜米粟”,主要交易粮食,而城外“东沟集,每逢二七贸易杂货”<sup>[12]</sup>。

一些城市的集市还订立了具体的规则。乾隆年间,运城御使杨绳武,为了杜绝欺行霸市行为特约法八条,比如,粮食到市,每石只许牙用一升;斗户不许调鬼语,欺哄乡愚;客贩任赴行家,不许斗户远接;斗遵官较,禁置副斗及割削口底,并用鸡子木刮;籴米先尽穷民;斗只许正身,不许朋伙窝集;生员、衙役、宦仆不许揽充斗户,市棍不许插身把持;集场务于东西北三关十日一轮,摆到通衢,不许隐藏场院之内<sup>[3]</sup>。

山西大学的行龙先生通过对清代至民国各州县所修地方志的查阅和整理,对这一时段内山西36个州县农村集市的数量分布及变迁进行了研究<sup>[13]</sup>,笔者稍做改动,列于表2和表3。

从表2可以看出,在36个州县中,除太原府文水县、蒲州府荣河县和万泉县、潞安府屯留县的集市数有明显增加以及汾州府临县、泽州府陵川县的集市数有明显减少外,其余州县变化不大。

从表3可见,在可比较的16个州县中,只有汾州府介休县、潞安府屯留县的开市场次有较大增长,蒲州府荣河县、平阳府太平县的集市场次减少幅度较大,其余州县集市场次数量变化不明显,甚至完全没有变化。

集市崛起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没有农村经济的振兴,也就没有乡村集市的兴起。只有当农村经济实力增强、剩余农产品增多时,才有足够的交易量来维持一个集市的存在和延续,新集市的产生需要同样的物质前提。

表2 清代与民国山西若干州县集市数变化表

	府州	县份	清前期	清中叶	清后期	民国
--	----	----	-----	-----	-----	----

晋中区	太原府	祁县	7	5	8	-
		文水县	5	-	14	-
	汾州府	介休县	6	2	-	2
		平遥县	8	-	8	-
		汾阳县	-	12	12	-
		临县	22	-	-	11
		平定	-	7	9	-
	平定府	寿阳县	-	15	14	-
		盂县	-	14	-	-
		吉州	1	-	-	-
晋西南区	平阳府	太平县	-	7	7	-
		襄陵县	3	-	5	-
		浮山县	2	2	-	-
		曲沃县	10	9	9	9
	蒲州府	荣河县	4	11	11	-
		猗氏县	3	-	3	-
		万泉县	-	2	-	13
	霍州	灵石县	-	10	-	11
	隰州	蒲县	-	5	5	-
	绛州	绛县	6	-	4	-
晋东南区	潞安府	长治县	-	19	18	-
		长子县	-	12	12	-
		屯留县	4	-	9	-
		襄垣县	-	6	-	7
		潞城县	5	-	-	-
	泽州府	高平县	11	-	11	-
		陵川县	9	-	4	-
	辽州	辽州	9	-	9	-
	沁州	沁源县	6	-	4	-
		武乡县	-	11	-	12
晋北区	大同府	广灵县	1	1	1	-
	忻州	定襄县	5	-	-	-
	代州	五台县	-	4	4	-
		繁峙县	-	3	3	-
	保德州	保德	2	-	2	-
		河曲县	0	-	3	-

注:由于城内不论有几次集市,其地点只有一个,即城内,故将所有城内集市数看作1。

表3 清代与民国山西16个州县集市场次数变化表

县份	清前期	清中叶	清后期	民国
介休县	6	21	-	39
屯留县	48	-	129	-
荣河县	78	-	-	48
太平县	-	56	36	-
汾阳县	-	120	120	-
平定州	-	60	72	-
祁县	105	-	120	-

猗氏县	21	-	21	-
灵石县	-	111	-	117
长子县	-	156	156	-
襄垣县	-	84	-	99
高平县	178	-	178	-
武乡县	-	108	-	117
广灵县	9	9	9	-
五台县	-	39	39	-
繁峙县	-	45	45	-

蒲州府万泉县,据乾隆《万泉县志》载,“解店镇……清康熙元年知县郑章倡建店舍兴起市集”<sup>[14]</sup>,此时村镇集市只此1个,至民国年间《万泉县志》载,村镇集市已有12个<sup>[15]</sup>。在新增集市中,有9个每旬仅开集1次,余者每旬开集2次。行龙先生认为,民国时期万泉县的集市既可以看作开集稀疏的集市,也可视为举会频繁的庙会,它们是集市与庙会合二为一的结果。清代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山西庙会大量增加,因此,万泉县集市数量的变化是在其集市、庙会合一的特殊情形下,对全省庙会发展共同趋向的间接反映,其中并不包含经济因素。蒲州府荣河县的集市由清前期的4个,增加到清中期和清后期的11个,而集市场次则由清前期的78次,减少为民国时期的48次。康熙《荣河县志》明确记有,冯村市、西李市、程村市、王显市俱废,这显然是明末战乱的遗痕,意味着在此之前荣河村镇集市至少有7个之多,与乾隆年间10个比较,增幅实际并不算大<sup>[13]</sup>。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使山西人口从1 643.3万人减少至1 065.8万人,这可能也是一些县份集市数量明显减少的直接原因。泽州府陵川县清前期城镇集市共9个,清末减少为4个。平阳府太平县在清中期集市场次较密,为56次,然而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使当地人口和农业生产均受到严重打击,集市场次迅速减少,清末只有36次,较清中期减少了36%。

从总体上来看,山西多数县份的集市数和场次数在整个清代变化不大。在表2中所列的36个州县中,有将近80%的州县集市数量长期保持不变。全省集市数量增减相抵,在总体停滞的基础上略有上升<sup>[13]</sup>。

## 二

庙会是农村集市的另一种形式。庙会除祭神外,其另一主要功能就是贸易。太原府榆次县五月城隍庙会,“届期资货云集四方,客商辐辏而至,发兑

交易日余始罢”<sup>[11]</sup>。太谷县“立春……二十一日汾河村民于庙祀神演剧，四乡商贾以百货至交易”<sup>[16]</sup>。代州繁峙县城每年三月十八日有砂河香烟庙会，届时“远近士民各以鸡鸭羊只入庙酬神，是日商贾云集”<sup>[17]</sup>。平阳府浮山县每逢庙会，“招集远近商贾贩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sup>[18]</sup>。绛州庙会以古龙坡的“老君庙会”和“东华山娘娘庙会”名气和规模最大，每逢庙会期，陕、甘、豫、冀、鲁等省客商云集<sup>[19]</sup>。

在清代，山西很多州县都有庙会，少则一二处，多则十数处。太原府榆次县“正月于怀仁、二月于聂村东阳、三月于郭家堡、四月于王都村、五月于邑城隍庙中，七月源涡鸣谦驿，凡会则陈优伶合乐，其城隍庙则会场之尤大者”<sup>[20]</sup>。平定州盂县，一年之中有33次庙会，会期长则5天，短则3天，全年共计有100日之多<sup>[9]</sup>。汾州府临县的城关、三交、碛口、招贤、南沟、兔坂、安家庄、从罗峪、白文等地都有庙会，其中七月会最隆重，七月初一碛口会，继而三交、城关、白文、兔坂、刘家会相继进行，一直持续到月底。其次是正月会，正月十三碛口会，继而是三交、招贤、城关、白文会相继进行<sup>[21]</sup>。

平阳府浮山县“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东门外东岳庙逢会，七月十五日城隍庙逢会，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张公祠逢会，招集远近商贾贩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sup>[18]</sup>。吉州城关、柏山寺、大庙沟等地农历三月二十七、四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腊月十三等有庙会<sup>[22]</sup>。蒲州府猗氏县有庄武王庙会、城隍庙会、关王庙会、东关集、高头里会等<sup>[23]</sup>。

潞安府长治县“岳鄂王庙会九月二十六日在南关，百货俱集，旬日而止；关帝庙会九月十三日在县北乡鲍店镇，亦旬日而止；草坊会五月十三日在县北乡，三日而止；尧庙会四月二十八日在县西南乡，五日而止”<sup>[8]</sup>。清嘉庆、道光年间最盛，全县年约百余次<sup>[24]</sup>。辽州榆社县每年正月至十月间，月月有庙会<sup>[25]</sup>。

大同府大同县庙会从正月初八的八仙日开始，二月初三有帝君庙会、三月初三有曹夫庙会、三月十八有娘娘庙会、四月初八有奶奶庙会、四月十五有鲁班庙会、五月十一有城隍庙会、六月初六有玉龙洞庙会、六月十三有龙王庙会、六月十九有观音庙会、五月十三和六月二十三有关帝庙会、六月二十三有火神庙会、七月十五有龙池盂兰会、八月二十七有文庙会。城郊沙岭、寺村、阳和坡等村，春祈秋收也举行庙会<sup>[26]</sup>。右玉县有大寺庙庙会（农历四月初八）、娘

娘庙会（农历三月十八）、雷公山慈云寺庙会、大南山显明寺庙会、牛心山庙会、封神台庙会、马莲滩村西六月六海子滩庙会。杀虎口从二月初八文昌庙会开始到十月十三东岳庙会，几乎每月有会<sup>[27]</sup>。保德州河曲县庙会正月有三次，二月有两次，三月有三次，四月有四次，五月有两次，七月有三次，八月有两次，十月有一次，共计二十次。会期以三日居多，共计六十多日<sup>[28]</sup>。

庙会所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以日用百货、牲畜、农具为主。太原府太谷县的阳春会，“卖货物者甚多，绸缎棚一巷，估衣棚一巷，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车马皮套棚一巷，其余磁器、铁器、纸张棚虽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杂货、旧货小坛，不可胜数。赶会之车辆约有数千乘，可谓大会矣”<sup>[29]</sup>。汾州府介休县九月二十至九月二十九是张兰镇泰山庙庙会，届时平遥、沁源、霍县、孝义、汾阳等地商号和手工业作坊都前来参加，此外，还有文水的皮货、浑源的挽具、沁州的麻货、上党的药材、内蒙古的骡马。解州庙会“商贾云集，百货具陈”。临县正月和七月的庙会以牛、马、驴、骡为主。七月初一碛口会以瓜果为主。十月初二是从罗峪扮羊会，上市扮羊可达数千只，汾阳等地客商前往购买。腊月十八为城庄公鸡会，上市公鸡可达数千只。六镇古会尤以三交会驰名晋陕，每年的骡马大会，陕西米脂、定边、关中、神木、榆林等地前来的骡、马、驴数量可观，河南、河北、晋东南、洪赵等地前来购买牲畜者接踵磨肩。三交骡马大会时，周围十数里村庄都住满各地客人<sup>[21]</sup>。平阳府浮山县庙会交易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百货、农具、瓜果、蔬菜、牲畜、金货、估衣、京广杂货、日用生活用品等<sup>[6]</sup>。

许多庙会有其固定的交易产品，如大同府大同城内六月十三的龙王庙会，以布行为主；六月十九的观音庙会，以银匠为主<sup>[26]</sup>。宁武府神池县六月初六的八角镇庙会主要以交易牲畜为主。绛州闻喜县三月初三县城祖师庙庙会也以交易牲畜为主，称为骡马大会。

清代，山西有四大庙会，即正月解州会、四月尧庙会、七月五台山会、九月鲍店会。其中，长子县鲍店会以商贾之繁盛、行业之众多、交易金额之巨大，在山西各庙会中首屈一指。鲍店，距长子县城北四十华里，位于潞安府的长子、屯留二县中间，为晋、豫、秦交往的要道。鲍店会起自何时，已难稽考，但它的极盛时代是在清代中叶。会期从农历九月十三

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历时一百天,主要交易商品有牲畜、估衣、广货、京货、药材等。会期前半个月为牲畜会,以骡马、牛羊为主,还有骆驼、驴等牲畜,分为羊会、骡马会。鲍店会开始后的十天左右,主要是羊的买卖大会。上党地区多山,牧羊既省人工,又无种籽、肥料支出,而且羊繁殖很快。如果羊群不发生传染病或其他伤亡事故,养羊一只,三年可繁殖成五只,农民养羊成本较低,所以农民几乎家家养羊,每年上会的有十几万只羊。继羊会之后就是骡马大会(包括牛、驴、骆驼等),上党地区的土特产如铁货、党参、蚕丝、草帽辫、花椒等运销各地,大部分用骡马驮运。每年秋季农事接近完毕,也正是农民骡、马、牛、驴交易旺季。因此,鲍店庙会骡、马等牲畜的交易,颇为繁盛。上会的骡驹有数千头之多,另外还有大批马、骆驼、牛、驴等,会上还有来自绥远的马贩子,赶来大批马匹到会上出售。阎锡山统治时期,在鲍店会对马、骡、驴等牲畜交易,征收40%的交易税,并实行包税制。当时豪绅巨贾争相包税,投标有达三万元者,可见,鲍店骡马会成交金额之大,每年有十几万只羊、千余头骡驹上会交易。

其间还有估衣会、广货会和京货会穿插进行。与骡马大会同时上会的估衣棚有三十余家,所出售的裙衫大部分来自晋中祁、太、平、介等地,多半为陈旧次品,经估衣铺翻改刷新,然后出售给贫苦农民以做嫁女或装裹之用。鲍店会的广货店以长治的万胜顺、万胜高和晋城的集全顺三家为最大,所占庙会棚址也供这三家优先挑选,其他广货店附属在其前后左右。广货店经营苏杭绸缎、广东铜器、北京丸药、吸食鸦片用的太谷十样景烟灯、寿州烟斗、汉口的水烟袋和官绅们用的缎靴与戏剧道具、乐器等。绸缎庄有河北顺德府复盛程和武安天德恒两家,专售苏杭绸缎。以上这两种行业,顾主大多是地主富农或官绅巨贾,也有少数中产人家为儿女完婚选购衣料。鲍店庙会上有京货铺数十家,专售妇女儿童用品,如绸缎零块、各色梭布、皮金、珠边、丝线、回绒、手帕、脂粉、珠花、儿童鞋帽、玩具等。首饰楼也有十余家,不搭布棚,就摆一张方桌,其上放置一个铁丝编成的两尺高、两尺五宽的笼子,内挂各种银饰。

在骡马大会结束之后,庙会便逐渐以药材交易为主,故又叫药材大会。每逢会期,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藏、青海、太原、北京等地药商,纷纷赶着骡马队、骆驼队,前来进行药材交易。川、广、闽、贵各省药商来时多带南方产品,如当归、川贝、大黄、黄

连、麦冬、元参、泽泻、牛夕、杜仲、肉桂、厚朴、霍香、木香、陈皮、槟榔之类,统称为“广壮南货”;河南、安徽客商来时多带生地、熟地、山药、牛川、菊花、红花、竹茹、竹叶等中药材,统称“淮货”;西藏药商还带来藏红花等藏药。另外,太谷县的广升远在此专卖自制男用龟龄集,广升誉在此专卖女用的定坤丹和冬参、鹿茸、犀角、砂王、开叩等珍贵药材;太原小店镇同心茂在此专卖舒筋散;绛州德义堂在此专卖自制的七珍丹;岢岚县中药厂在此专卖自制的全鹿丸;武安、邯郸等地药商在此推销天津产的多种中成药,周围各县的好多中药厂和药店也大都在此进行购销业务。药材交易品种之多,成交额之大,十分惊人,与当时的河南辉县药会、河北安国药会、山西解县药会齐名。在广、川、闽各省大部分药商中,享有“山西鲍会”之誉。

鲍店镇共有和盛行、义兴行、三义行三户药行,从业人员五六十人,大会期间,专为来客交流信息、识别真伪、分等论级、面议价格、成包过秤、代为报税、揽车送货,办理开具清单、结算金额等。鲍店全年有传统庙会四个,会上唱戏等一切费用开支,皆由全镇四街农四、商六分成均摊。唯有药材会期间唱戏等一切公用开支,由药行、药棚集资承担。从此也可看出,当时鲍店药材会的盛大规模和气势。

### 三

清代,山西商人在全国商业金融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山西农副产品加工业、工矿业的商品生产与发展亦十分活跃和多样,这都为农村集市和庙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清代山西集市的发展并没有呈现“活跃”情形,没有出现“一个快速成长的极盛时期”,而庙会则在数量、规模上均超过集市,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的原因。

其一,土地贫瘠,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保德州的河曲县“近塞苦寒”。汾州府汾阳县,“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汾阳尤最。人稠地狭,岁之所入,不过秋麦谷豆”。位于汾水冲积平原的绛州,“绎古唐地,旧称土瘠民贸,迄今地狭土燥,民无可耕俯仰无所资”。甚至在“富甲天下”的晋中祁、太、平地区,也是“土瘠民贫,俗尚勤俭”。平遥“水崩沙浅,生理鲜薄,民生其间终岁勤劳”。在这样一种仅能维持生存的状态下,山西居民可以用来交换的农产品较少,相应集市数量就停留在较低的程度上。

其二,天灾影响,“丁戊奇荒”使山西人口急剧减少。山西地处气候干燥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清

同治十三年(1874年),山西中部已经开始旱灾,到光绪三年(1877年)发展成全国大旱,旱情一直延续到光绪五年(1879年)才有所缓解,但瘟疫、鼠患接踵而来,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当时,凤台县“有全家俱毙者,有阖村同尽者”;猗氏县“多者十损六、七,少亦十之三、四”;新绛县“村中户绝半,人十毙六、七”;太原县“民死于饿者十之六、七”。受灾最为严重的是临汾县,人口从174 558人减少到73 716人,减少了58%。全省人口由受灾前的1 643.3万人减少至受灾后的1 065.8万人,总计减少近600万人。这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恰恰集中在当时山西商品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晋中、晋南及晋东南地区,大大破坏了当地的手工业生产,对整个山西省的集市发展造成了巨大打击,延缓了山西集市的发展和数量的增长。

其三,庙会的替代作用。庙会是农村集市的一种形式,但它的交易者和交易商品来源更广泛、交易规模更大、时间和会期间隔更长,多循季节更替而举办。由于庙会具有如上特点,因此,会上交易商品更为丰富。例如,太原府太谷县阳春会,交易商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潞安府长子县鲍店会,交易的商品同样包罗万象,且数量巨大。随着农副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庙会因其举办周期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极为一致的特点而规模急剧扩大,数量急增,从而吸收了农民的大部分农闲产品,而集市交易商品则相对匮乏,不能提供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物品。正如光绪《文水县志》记载:“境内无多商贾,平居一箕之微,无从购置,惟恃有庙会,则四方齐集,百货杂陈,民间日用之需,耕获之具,皆取给焉。”

#### [参考文献]

- [1] 李培谦,阎士骥.阳曲县志·户口(卷7)[Z].葛英繁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 [2] 候康民,贾 漯.蒲州志·市集(卷2)[Z].刻本.清康熙九年(1670年).
- [3] 言如泗,熊名相.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3)[Z].刻本.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 [4] 崔澄寰,王嘉会.续修隰州志·市集[Z].刻本.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 [5] 王谋文.介休县志·堡寨·市集(卷1)[Z].刻本.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
- [6] 浮山县志编纂委员会.浮山县志·集市[Z].北京:中华书局,2002.
- [7] 杨飞熊,崔鹤龄,李思豫.临县志·集市[Z].刻本.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
- [8] 李 楷,马 鑑,杨 笃.长治县志·建置·市集(卷3)[Z].刻本.光绪二十年(1894年).
- [9] 孟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孟县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 [10] 宋起凤,岳宏馨.灵邱县志(卷4)[Z].刻本.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 [11] 俞世铨,陶良骏,王平格.榆次县志·风俗(卷7)[Z].凤鸣书院刻本.清同治二年(1863年).
- [12] 王克昌,殷梦高.保德州志·市集(卷1)[Z].刻本.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
- [13] 行 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2).
- [14] 毕宿焘,张史笔.万泉县志[Z].刻本.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 [15] 何 炎,程瑶楷,冯文瑞.万泉县志·集会[Z].石印本.民国七年(1918年).
- [16] 恩 浚,赵冠卿,王效尊.太谷县志·风俗(卷3)[Z].刻本.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
- [17] 吴其均.繁峙县志(卷2)[Z].刻本.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
- [18] 鹿学典,武克明.浮山县志·风俗[Z].刻本.清光绪六年(1880年).
- [19] 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绛县志·商业[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20] 钱之清,张天泽.榆次县志·风俗(卷6)[Z].刻本.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
- [21] 临县志编纂委员会.临县志·商业[Z].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 [22] 吴葵之,裴国苞.吉州志[Z].刻本.清光绪五年(1879年).
- [23] 宋之树,何世勤,陈简仪.猗氏县志[Z].续修刻本.清雍正七年(1729年).
- [24] 垣曲县志编纂委员会.垣曲县志·商业[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 [25] 胡德荣.榆社县志·商业[Z].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 [26] 大同地方志办公室.大同县志·商业[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 [27] 右玉县志编纂委员会.右玉县志·商业[Z].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8] 河曲县志编纂委员会.河曲县志·商业[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 [2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李 莉]